

当前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 第2期 (2007):

科技与社会

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

吕乃基^[①]

摘要 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处于较低层次的基础性而渗透到较高层次的知识中;因其抽象性而可以和各种语境相结合;因其与任何特殊的价值无关而成为各种特定的善和美的共同基础。非嵌入编码知识构成与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及人文知识之争。非嵌入编码知识销蚀、推翻、抹平作为传统权力之基础的嵌入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挑战这些知识的权力。非嵌入编码知识沿知识序列向上渗透,构成对人源于自然的行为和关系的“倒逼”,使之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有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依据。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基础。这就是非嵌入,也就是吉登斯的“脱域”。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与语境无关,而又作用于所有人。无论接受与否,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源于其本身,总在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知识的权力范围与其嵌入的范围成正比,知识权力的强度与其嵌入范围成反比。

随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最新发展,既产生出专业知识和选择的权力,也在消解非嵌入编码知识原有的权力。

关键词 非嵌入编码知识 权力

目前,“知识就是权力”已经为学术界所认可,并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界已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展开研究^[②]、^[③]、^[④]、^[⑤],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把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权力的关系^[⑥]。由于知识还可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等,不同类型的知识会拥有各异的权力,或与权力间形成不同的关系,因而有必要对知识作进一步分析,以推进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规范在实际中的应用。本文集中讨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

一 引言

如所知,根据波拉尼的有关研究,人类的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⑦]。其中,编码知识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⑧],前者又可分为三类,其一属于特定的人群如夫妻、朋友和社群等,知识在内容上与主体不可分割;其二属于特定的场合或语境,大到国家的法律,小到企业的制度。“入乡随俗”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是专门的知识如医学、基本粒子物理等,知识虽在内容上可以与主体和语境分离,但由于知识本身的专门和艰深,进入的门槛高,需要各种相关知识的配套,如医学涉及到生物学、细胞学、化学和物理学等,以及各种仪器设备,因而也具有嵌入性。嵌入的编码知识只能在所“嵌入”的范围内交流与共享。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如四则运算、勾股弦定律、杠杆原理等一些简单基本的科学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当然嵌入与非嵌入不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

权力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权。大致包括以下方面:权力的作用者和承受者、权力的范围和条件、权力本身受到的制约,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等。

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知识体系中重要的同时也是基础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特点在于与初始条件(历史)和边界条件(语境)无关,与对象本身的个性和特殊性无关,以及与主体无关。简言之,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超越性”,或如吉登斯所言的“脱域”。



科学文化评论

非嵌入编码知识位于知识序列上相对较低的层次。在本体论上,知识序列指知识的对象在量子阶梯上的位置,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以及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位置,如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艺术等。于是,处于相应较低层次的物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由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可知,逻辑上位于较低层次,也就是在历史上处于尚未分化的较早阶段。非嵌入编码知识在历史和逻辑上成为人类知识的基础。在认识论上,知识序列指知识在认识过程中的位置,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理性阶段的知识,是理想化、归纳和抽象、“脱域”和还原后得到的知识。纯粹地对应于这种知识的对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仅存在于思维之中。在真善美的序列中,知识序列指相应于真、善、美三者的位置。非嵌入编码知识指相对独立于善和美的真。

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处于较低层次的基础性而渗透到较高层次的知识中。不同的对象在高层次会有所不同,但其低层却是相同的;所有的对象都有自己的起源,越向前追溯,越通往共同的起源(如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由此可见非嵌入编码知识对于各种对象的一致性。在认识的理性阶段,知识与特定对象的历史和语境无关,与特定的认识主体无关。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抽象性而可以和各种语境相结合,渗透到各种嵌入的编码知识中。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基础,这就是非嵌入。因而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个人所共享和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与任何特殊的价值无关而成为各种特定的善和美的共同基础[9]。在此意义上,非嵌入编码知识实际上拥有最大、最普遍和永恒的价值。

由于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最初所面临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相对于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梁漱溟)的基础性,以及由于自然对于各民族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因而非嵌入编码知识最初即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随之也就发展出科学和技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通过抽象、归纳、分析获取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方法,以及在实验室中通过简化、固定、分割等以控制自然的手段和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就被用以审视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被推广和渗透到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及沿着知识序列逐步提升。由此就构成了知识的权力之争。

二 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之争

传统社会中的权力建立于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基础上。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核心是传说、制度和价值观,带有浓厚的地域甚至个人因素,其源泉是特定的生活经历,因部落、乃至因人而异,深扎在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至遥远的历史体验之中,以及形成于由偶然的个别事件所构成的人与自然的交往活动之中。正是这种各具“特色”的根源系统规定了作为传统权力基础的知识体系属于嵌入的编码知识,具有不可化归的独特性。传统权力的范围与知识嵌入的范围一致。嵌入编码知识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权力强化并灌输嵌入编码知识(如科举考试与儒家文化),后者依赖权力方能作用和改变现实[10]。一旦权力越出相应嵌入编码知识的范围而进入其他嵌入编码知识的领域,战争便不可避免。

在相近的意义上亨廷顿论述道:“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亨廷顿2003, p88、252]。非嵌入编码知识通过销蚀、推翻、抹平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并取而代之,通过以其本身之得来所应用的方法对嵌入编码知识的质疑,以及通过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而销蚀传统权力的地基。总之,非嵌入编码知识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获得权力,于是就构成对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和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权力的挑战[11]。

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共享,就此而言,非嵌入编码知识达到最大限度的民主,构成对任何形式独裁的挑战。非嵌入的程度越大,对传统或暴政权力的挑战也越大。自从近现代非嵌入编码知识兴起,这一权力之争就从未停息。就知识的历程而言,非嵌入编码知识终究要改造和取代嵌入编码知识,并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嵌入编码知识。然而由于权力——以各种嵌入编码知识为自身辩护——的影响,实际情况要复杂和漫长得多。由于种种原因,非嵌入编码知识产生于西方,由此而强大起来的西方便侵略落后民族。这样的行为往往还以非嵌入编码知识如“民主”的名义。殖民地民族为争取独立解放也就把源于西方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拒之门外,从而在取得独立的同时加强了原有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这样的权力之争一直延续至今[12]。

站在这一视角来看,当前学术界所发生的所谓“科学大战”,就是第三世界学者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的权力寻求生存空间。少数民族和其它边缘地带的人群的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对以科学为代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激烈批判,成为边缘社会人群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而作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其自身文明的“认识论权利”,冀望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自己的宇宙观与民族科学,发现与西方科学毫无联系的自然规律,以解除他们“心灵的殖民化”。

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第三世界的学者们没有看到,每一种地域暴政的出现,往往都是通过文化上的纯粹性为自己寻求辩护。维护传统的嵌入编码知识伴随着暴政。其次,当真理是依靠内在的语境——地方性来定义时,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就会获得其合法的外衣,结果是以知识界的种族隔阂而告终[耶冬梅 2003]。

由WTO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各国在加入WTO时的谈判,成员国之间“某某”回合的谈判,都体现了非嵌入编码知识与各国所持的嵌入编码知识及双方背后的权力之争。WTO的三大基本原则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世界贸易中的集中体现。WTO超越传统主权,排除一切嵌入编码知识及其背后的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扰。WTO的规则受到所有成员国的遵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申请加入,而这又反过来说明非嵌入编码知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大力量。

其实,一旦第三世界的人民感到因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而能推翻压在身上的权力甚至能获得权力时,就会主动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时,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实际上,随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兴起,传统的嵌入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其中所隐含的共性部分会进入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流淌到全世界,而个性部分将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得到重新阐释而获得新的生命,成为新的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非嵌入编码知识既源于先前受制于语境而不可通约的知识,又为新的嵌入编码知识的构建提供统一的平台,使之得以超越各自的语境而彼此“商谈”(哈贝马斯)、交往,并在共同平台即真的基础之上构建善和美。

三 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争

处于知识序列低层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推广和渗透到相对高层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显然，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涉及的对象远较自然界来得复杂、多变、具有个性，以及处于不同语境之中。将其当作在实验室中一样进行简化、抽象，以在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操作所形成的理性来认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就可以获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如经济人假设、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然状态”，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等。然后再把由抽象或实验室得到的知识、由这些知识的物化制成的产品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在上述过程中就是对现实施加了权力。例如机械、流水线等对人的影响一直达到一个个单一的动作，提高了效率，也会带来问题。或“异化”，或“人是机器”、“单面人”之类；甚至按实验室的要求构建社会，如工厂、学校、医院和监狱等“规训机构”，被福柯称之为“细部的政治解剖学”[13]。

在上述影响中，最普遍的、强制性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以科技黑箱[吕乃基 2001]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技术。科技黑箱支配人的行为，影响交往，而且还是一种律令：非此将造成后果，至少不能成功或降低效果。可以借用海德格尔“促逼”概念，但又超越其原意。在海德格尔那儿，促逼主要指技术的发展对人的促逼，而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促逼还在于其对历史的“根除”和个性的“抹平”。“科学对日常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世界的转移”[劳斯 2004, p241]。这或许是“知识就是权力”的主要部分。

这样，“通过科学技术和设备的标准化，通过对非科学的实践和情景的调整以适应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践的应用，这些发展……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的世界中……”。因此，世界逐渐成了一个被构造的世界，因为它反映了技术能力、工具设备及其所揭示的现象的系统化拓展”[劳斯 2004, p226]。非嵌入编码知识在这样的扩展中便引发了与人文知识的权力之争。

前述“科学大战”除了反映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传统文化之争外，还反映出当代特别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为争夺学术地盘所进行的权利斗争[劳斯 2004, p241]。这种斗争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存在。一方面，人文学者们痛感“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就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我们无法逃避技术对我们的挤压[14]。另一方面，又有学者认为，在强调“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如以“社会良心”自诩，“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朱苏力 2004]还有一些不容置疑的字词，如“真正”、“良知”、“理想”、“公正”，以及最近时兴起来的“敬畏”等等——这些字词是证明其他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有人称之为“术语拜物教”[吴亮 2005]。

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微分权力”的影响下，每个人的各异的、在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天然”的行为，被改造成基于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一致的、机械的和标准的行为[15]；以及将人的基于自然的行为，改造成基于人工自然的行为，改造成“单面人”。形形色色的反科学思潮都与此类权力之争有关。然而，毕竟人类所创造的“世界4”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马克思）。这既是“抹平”，更是起点，是人类由自然到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是通向实质性平等的桥梁，是一种现阶段不可超越的社会结构[段伟文 2003]。

其实，反对以科学技术为典型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人文主义者没有认识到，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必将渗透到一切领域，这是客观规律。权力并非强加，也不依赖于接受者。无论被接受与否，总是在不断增长、发展，并且“默默地”发挥影响。劳斯细致地发现，“这些限制具有与传统的权力关系截然不同的形态……并非是某种施加于特定事物和人，并为他人所掌握和应用的权力形态”，而是一种“支配活动身体的微分权力”或“微观社会关系中的规训权力”，“这些限制遍布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和对事物的处理中，并且渗透到最琐碎、最普通的活动中”[劳斯 2004, p259]。普费弗也认识到，“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使用就越有效果……”[劳斯 2004, p259]。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非嵌入编码知识并非淹没个性，而是对源于自然、历史和特定语境的知识的改造，并为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个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提供可能和广阔的前景。对非嵌入编码知识持偏激心理的人似乎有鲜明的个性，实际上表明没有信心和力量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个性。

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正是这些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基础之上的技术及其产品，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默默”做着贡献的硬件和操作及系统软件。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凯勒指出：“在把客观性当作男性主义理念加以拒斥的同时，女权主义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并把女性驱逐出了现实政治的现代文化之外：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自己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劳斯 2004, p272]。

四 非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特征

权力与知识的边界一致。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知识既然没有边界，其权力也就没有边界。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与语境无关，而又作用于所有人。无论接受与否，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总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权力的产物”[亨廷顿 2003, p.88]。如果把这里的文明换成知识，意味着亨廷顿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必须指出，在非嵌入编码知识及其权力的关系上，权力是知识的产物，而不是相反。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必须依赖权力方能作用和改变现实，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亨廷顿的话改为“普世性权力只能是普世性——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产物”。

正因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具有这样的特征，因而各种世俗权力便纷纷附着于其上，如冠以“科学”之头衔，以贩运私货，谋取利益。少数科学家也主动投靠于世俗权力，以从中获利。诚如罗兰夫人所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然而此处需区分非嵌入编码知识和附着于其上的嵌入编码知识[16]，区分非嵌入编码知识本身的权力和附着于上的权力，不能在去除后者的同时抛弃非嵌入编码知识。

非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特征还可以从与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对比得到进一步说明。以医生拥有的专门知识及其“话语权”为例，这是知识高度分化的结果，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包括时间），同时又是知识高度综合的结果，需要各种设备和其他人员和组织的支持。在此意义上，这种知识简直就是嵌入的编码知识。同时，患者又对这种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因而，一方面嵌入，另一方面是需求，这样的嵌入编码知识便具有权力。知识的权力来自嵌入和需求。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对需要专门知识的人拥有权力。显然，知

